

周锡瑞 (Joseph W. Esherick)
加利福尼亚大学历史系教授

“封建堡垒”中的革命 陕西米脂杨家沟*

1947年12月，中国的命运面临重大的转折点。抗日战争的火灰未冷，内战的烽烟已经弥漫全国。尽管蒋介石的军队攻取了中国共产党的战时首都延安，毛泽东与其它领导人则轻而易举地到附近的乡村躲了起来。

当国共两党的军队在全国战场进行生死较量时，毛泽东给中央作了一个报告。他说，人民解放军在军事上的胜利已经使革命斗争从对根据地的防卫转变为向国民党军队进攻并消灭他们。这一胜利的重要原因之一是土地改革巩固了农民对中国共产党的支持。毛泽东正确地断言，中国已到了“转折关头”^①。实际上，中国共产党的军队在1948年取得了一系列决定性胜利。

毛泽东作上述报告时化名住在陕北米脂县杨家沟这一偏僻的山村中。40年之后，我于1989

* 感谢悉尼科技大学“抗日战争时期华北根据地史讨论会”的与会者们，特别是 John Fitzgerald、李向前和陈永发等人的教示。我还要感激我在陕西的那些朋友和同仁，以及接受我访问的对象。本项目得到中美学术交流基金的赞助。

① 毛泽东：《目前形势和我们的任务》，1947年12月25日在中央会议上所作的报告。《人民日报》1948年1月1日。

年 2 月到该村对老人进行访问，就住在毛泽东、江青和周恩来当年住的那间地主大院内。1942 年，前中国共产党总书记张闻天曾被派到杨家沟调查农村的生活并写了一份详尽的报告，很多人根据他的报告对杨家沟进行了研究，以英文或日文发表。因此我在访问杨家沟之前对它已有相当的了解。后来，我在陕西省档案馆及地方档案馆中发现了很多关于米脂和杨家沟的报告。我将这些报告与其它文献相互印证，试图描述那个县与那个村的历史。^③

“封建堡垒”杨家沟

杨家沟坐落于陕甘宁边区的一个山沟里。陕甘宁边区是人烟稀少、交通闭塞的贫瘠地区。毛泽东及中国共产党军队于 1935 年经过长征到这里。在 1937 年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后国共两党建立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蒋介石国民党政府承认中国共产党在陕北的合法存在。中国共产党的首都延安很快便成为爱

延安农村调查团(张闻天带领):《米脂县杨家沟调查》北京 人民出版社 1980; Evelyn Rawski, 'The Ma Landlords of Yang-chia-kou in Late Ch'ing and Republican China', in Patricia Ebrey and James Watson, *Kinship Organization in Late Imperial China* (《中华帝国晚期的宗教组织, 1000—1940》),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86 河地重造,《二十世纪中国地主 陕西省米脂县杨家沟马氏》,《东洋史研究》, 21 卷 4 号(1963) 河地重造,《1930 年代中国农民层分解把握》,《历史研究》, 290 号(1964); 深尾叶子,《米脂县杨家沟第一次调查报告书》大阪, 日中共同华北农村调查团, 1995。

我用相似的方法研究过另外一个县, 参阅拙文 'Deconstructing the Construction of the Party State: Gulin County in the Shaan - Gan - Ning Border Region', *China Quarterly*, 140 (December 1994).

国青年以及全球进步记者的麦加。按照中国共产党的宣传延安是“革命圣地”陕甘宁边区是全中国民主与进步的典范^④。

杨家沟并不是边区的“典范”。在陕北无定河流域的榆林、米脂、绥德三个县是这个贫穷地区中最富裕的地带。在整个边区人口密度只有每平方公里 15.2 人而绥德地区则高达 47.4 人是平均数的 3 倍^⑤。陕北的三所最好的学校也都集中在这三个县。建有著名的中学和女中的米脂县被认为是陕北的“文化中心”。有人认为米脂县城之文明现象，比省会西安有过之而无不及^⑥。不过，在中国共产党革命中，米脂则是以其大地主出名。1942 年的一个调查报告指出：“米脂是历史上大地主集中的地方”。甚至在中共统治该地时地主的土地也没有被没收分配。米

^④ 当时关于这一地区最著名的记录当然要算埃德加·斯诺的 *Red Star Over China* (《西行漫记》) New York: Grove Press, 1961, original edition in 1938 参阅他的 *Random Notes on Red China* (《红色中国笔记》) Cambridge: Harvard University, East Asian Research Center, 1956; *Nym Wales, Inside Red China* (《红色中国秘密》), New York, Doubleday, 1939; Harrison Forman, *Report from Red China* (《来自红色中国的报告》), New York: Whittlesey House, 1945. 后来的学术研究成果有马克·塞尔登 Mark Selden 的经典性著作 *The Yanan Way in Revolutionary China* (《中国革命的延安道路》) Cambridge: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71。他最初写作该书时的激情现已平静下来，他在最近出版的修订本中为自己降了温。匹特·斯朗 (Peter Shran) 出版了一部对革命很富同情的经济史著作 *Guerrilla Economy: The Development of the Shensi—Kansu—Ningsia Border Region, 1937—1945* (《游击经济：1937—1945 年间陕甘宁边区的发展》) Albany: SUNY Press, 1976. 纪保宁 (Pauline Keating) 写了一部很好的博士论文 *Two Revolutions: Village Reconstruction and Cooperativisation in North Shaanxi, 1934—1945*, (《两种革命：1934—1945 年间陕西的乡村重建与合作化》), Australian National University PhD Dissertation, 1989, 最近的著述则集中于延安整风运动。来自中国的著作有戴晴《王实味与野百合花》来自台湾的有陈永发《延安的阴影》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 1990 年。来自美国的有 David E. Apter and Tony Saich, *Revolutionary Discourse in Mao's Republic* 《毛氏共和国的革命话语》, Cambridge: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94.

房成祥、黄兆安主编：《陕甘宁边区革命史》，第 65 页，陕西师大出版社，1991。

^⑤ 袁德新：《陕北社会状况一瞥》，《新陕西月刊》第 53 期，1931 年 9 月

脂和邻县绥德的地主还被认为是“全边区的地主阶级的代表”^⑦。米脂县的地主则以杨家沟最有名，这个地主堡垒中最大的地主是米脂和绥德纳税最多的人，也许也是整个边区纳税最多的人^⑧。到 40 年代，该村马家家族拥有全村的土地以及邻村或更远地方的 14,000 垧田地（一垧约等于三亩）^⑨。

马家的财富和权力使其家庭成员成为杨家沟不可争辩的主人。马家的佃户和雇工格外依赖其主人。主人可以随时退佃，因而佃户们每时每刻都要小心翼翼，担心一旦得罪主人便无地可耕了。151 户这样的佃户住在属马家所有的窑洞中。在那种恶劣的气候中，这些佃户更加担心在天寒地冻的时候被马家赶出窑洞^⑩。而且，几乎所有佃户都欠马家的租，常常是世代代欠下来的。这在某种程度上体现了地主在收租一事上的高姿态。当地的收成每年差别很大。但是，更重要的是债务变成束缚佃户特别是帮工的绳索。长工们往往在春夏之交都要借债，长工对主人的人身依赖更强。无论什么时候，地主有招呼，长工及他们的妻子都要即刻到地主家去打杂^⑪。

地主控制并不仅仅是依赖这些强制性的依赖关系，马家也用施仁布恩来笼络人心。毛泽东和周恩来 1947—1948 年所住的大院是紧傍峭壁建造的。地主马新民在 1929 年大饥荒的时候开始建造这个大院，只雇杨家沟的工人，而且只管伙食而不付工钱。这是赤裸裸的剥削，但村民们却认为这是一种救济，使他们

^⑦ 柴树藩、于光远、彭平：《绥德米脂土地问题研究》第 111 页，第 113 页，北京，人民出版社 1979 年，该书 1942 年初版于延安。

^⑧ 同上，第 122—123 页。

^⑨ 《米脂县杨家沟调查》第 16 页，米脂河岔区委，《关于杨家沟的土地问题》，1946 年 8 月 9 日；米脂县档案馆永久卷 4。

^⑩ 《米脂县杨家沟调查》第 24 页；《关于杨家沟的土地问题》；米脂访问，1989 年 2 月 23 日。

^⑪ 《米脂县杨家沟调查》第 94—95 页，第 132—144 页。

不至于挨饿或搬往它处^⑫。这样做的结果是 杨家沟的农民们对马家感恩戴德。实际上，在战后的土改中，共产党干部发现农民们是地主的“驯顺奴隶”发现农民们都是宿命论者相信“富贵由天”和“主尊奴隶”^⑬但是主人并不因此而感到安全他的院墙外面日夜都有人巡逻^⑭。

1934—1935 年间，时代翻转的迹象开始显露，共产党的游击队开始在邻近的地区建立苏维埃并实行土改。马家从绥德招来一个连的军队来保卫其安全，这个连一直驻扎到 1935 年秋。村民们被组织成民团，但马家沟并没有受到直接的威胁^⑮。但是，地主们确实感觉到了事情的变化：到外村收租遇到了麻烦，地价猛跌，地主们的买地热情低沉了一段时间。而且地主们纷纷放弃高利贷经营^⑯，后来政府军的反击将当地游击队压下去了。国民党和地主的权力依旧，甚至到抗战初期也还是如此。

抗战早期

尽管红军主力于 1935 年底抵达陕北 米脂县的地主在驻榆林的当地军阀八十四师的支持下仍然在未来的两年内继续维持着往日的威风。紧接着是西安事变后的国共和解。1937 年 7 月抗战全面爆发之后，米脂被划入八路军的防区。八路军于 11 月

^⑫ 米脂访问，1989 年 2 月 22 日。

^⑬ 《关于杨家沟的土地问题》。

^⑭ 观山：《陕北唯一的杨家沟大地主》，《新中华杂志》第 1 卷第 16 期第 34 页。

^⑮ 《米脂县杨家沟调查》第 31—32 页。

^⑯ 同上第 59 页第 89—91 页，第 124—125 页，第 160 页，第 162 页，第 167—168 页。米脂访问，1989 年 2 月 27 日。

进驻米脂。但该县政权仍在国民党手里 听命于驻绥德的专员何绍南^⑮。

在抗战最初几年里 国共两党都在米脂争夺优势。八路军通过民运股来支持当地的左翼势力。但何绍南是位顽固的能人 他有效地抵制了中国共产党的减租政策，并组织学生和发表演讲来抵制共产党的影响^⑯。1939 年到 1940 年间 边区周围的国共关系紧张起来，国民党抢先夺取了关中和陇东的六县城及其广大地区。中共中央在日军进攻山西之时 调王震的三五九旅回师防守黄河防线。这造成了中国共产党军队在米脂、绥德地区处于优势。1940 年 3 月，何绍南被指控与腐败贩毒有染，被逐出边区^⑰。赶走何绍南之后，中国共产党第一次有机会在米脂发展其势力。虽然县长仍旧由国民党人担任 但中国共产党所组建的抗救会成为实际上的权力机关。乡村基层政权彻底易手 保长及联保主任都通通换了人。中共同时也发出枪支管制令 对所有枪支进行重新登记。他们还逐步进行教育、禁止鸦片和税收、救济等方面的改革^⑱。最为重要的是，中共在乡村中建立其权力。按照中国共产党所发布的文件 他们所建立的农协组织 接管了旧政

^⑮ 贾拓夫《关于边区土地政策问题的报告》，1944 年 2 月 载《抗日战争时期陕甘宁边区财政经济资料摘编》第 2 卷，第 300—301 页 西安 陕西人民出版社，1981。

^⑯ 《陕甘宁边区革命史》，142—143 页。

^⑰ 《陕甘宁边区革命史》第 148—159 页 肖劲光《加强河防 反对造谣破坏的阴谋家》，《新中华日报》，1939 年 12 月 9 日 载西北五省区编篡领导小组中央档案馆编：《陕甘宁边区抗日民主根据地》北京 中共党史出版社，1990 上卷 第 236—238 页；《中共中央书记处指示》，1940 年 1 月 10 日，《抗日战争时期陕甘宁边区财政经济史料摘编》第一卷 第 305 页；《米脂县县级三三制调查材料》，1944 年 6 月 米脂县档案馆 永久卷。

^⑱ 王震李景波《〔绥德〕行政工作报告》，1940 年 4 月 陕西省档案 2（全宗号）1（目录号）—164 卷宗号—1（顺序号）；〔以下只用数简称〕刘景范《工作报告》1942 年 5 月 9 日。陕西档案 2—1—164—2。

权的工作’^⑲。1940—1941年也是农民大批入党的年头。战后的数字显示在米脂的2090位党员中1168名是1940—1941年间入党的，为总数的56%^⑳。

新党员的机会主义动机是明显的。当时吸收人们入党的一个主要口号是“不当兵、负担轻、打官司赢”^㉑。与此同时，中国共产党也很注意党的阶级纯洁性和思想的纯正，开除了15%在战前入党的党员，并警告人们不要随着上升为中农和富农而产生“资产阶级思想”，不要让地主混进党内^㉒。在最后这一点上，他们干得很成功。1944年后公布的统计数字表明，95%的党员出身于贫农或中农，只有0.09%的党员出身于地主家庭^㉓。

不过，共产党人所采取的自上而下的策略使他们的基层政权难免留有某些空隙。1944年的一份调查表明，村长中有28.8%是共产党员，24.6%是所谓的“反动分子”，旗鼓相当^㉔。杨家沟地主的势力肯定没有受到很大的打击。最大的地主马维信最初被选为保长，后来又被选为区长^㉕。村里的七名党员只敢秘密开会来听取上级的指示，不敢向村民们公开他们的党员身分^㉖。

⑲ 《米脂县县级三三制调查资料》米脂访问，1989年2日。

⑳ 《农村支部情况》米脂档案，第6卷，日期落款为1946年，但内部资料表明应该是1947年。

㉑ 同上。

㉒ 李富春：《陕甘宁边区党的工作》，《解放》，1939年11月20日；《中国陕甘宁边区党委组织部指示》，1939年9月21日。《陕甘宁边区抗日民主根据地》第2卷，第520—521页，《陕甘宁边区党组织的现状》，1941年1月13日，《陕甘宁边区抗日民主根据地》第2卷，第524—528页。

㉓ 《陕甘宁边区党组织的现状》。

㉔ 《米脂县县级三三制调查资料》。

㉕ 《米脂县杨家沟调查》第32页。

㉖ 米脂访问，1989年2月23日、2月26日。访问的7位党员中，6位有堂、表关系。

中共与地主

米脂是地主势力的中心，因而也是检验中国共产党是否能够与其阶级敌人结盟的关键场所。战时的政策与宣传都强调将苏维埃时代的没收土地政策转变为温和的减租减息政策，都强调要吸收开明士绅及所有进步分子参加统一战线。中国共产党还举行地方参政会并推行代表的“三三制”^②。

在米脂统一战线政策是由八路军三五九旅旅长、绥德分区专员王震来掌握执行的。新政权所发布的文件常常谴责地方政府干部对地主的“关门主义”态度^③。这些地方干部多年来一直在与地主们进行生死搏斗，当然不愿与阶级敌人共事。一份报告还指出，这些干部还担心他们的对手“太能干”^④。这些农民干部们抱怨说：“咱们流血搞起来的政权，又让地主豪绅们跑进来，敢保不会上当？”^⑤

1940年初的统一战线只不过是表面文章。国民党的县长仍官任原职，但由共产党掌权的下级权力机关认为国民党县长只是摆设而已，因而都绕过县长而找具体管事的科长^⑥。中国共产党的某些地方领导人认为“三三制”就是同士绅合作，凑人数。因此，在政府机关里摆些空位，安排给那些不能作事的人。结果，既

^② 《陕甘宁边区革命史》第 214—219 页。

^③ 刘景范、刘英、白东才：《工作报告》，1940年 4月 24 日；汪震、李景波（《绥德》行政工作报告）；汪震、曹力如《米葭工作》，1941年 5月 18 日；陕西省档案 2-1-191-2。

^④ 刘景范：《工作报告》，1940年 5月 9 日；陕西省档案 2-1-164-2。

^⑤ 转引自《陕甘宁边区革命史》第 219 页。

^⑥ 刘景范：《工作报告》。

影响工作 也没有团结好士绅^④。

尽管有来自下面的抵制 王震还是与地方精英相处很好。赶走何绍南之后,包括马新民在内的地主被中国共产党邀去共同制定新的减租减息条例^⑤。在次年的选举中,30名地方士绅参加了筹备委员会^⑥。在没有经过土地革命的米脂县等地,地主们最初对共产党深怀“恐惧害怕”^⑦。但是,久而久之,他们的阶级自信压倒了这种恐惧。米脂的地主们认为他们是传统士大夫的继承人,并不把缺乏教育的新干部看在眼里。而且,新干部们同样不信任地主,并把他们排除在日益成为实际政府的救国会之外。地主们指责这些新干部违反了党的民主原则。他们说:“民主是假的,这里没有民主”^⑧。

恐惧与疑虑为现实主义的考虑所冲淡,新形势要求地主们灵活地对付其阶级对手。无论如何,地主支付了因战争而变得非常沉重的税,他们在策略上也与新政权建立起个人关系。至少,他们中的很多人允许甚至鼓励他们的女儿嫁给共产党人。杨家沟最大的地主马维新有两个女儿嫁给共产党人,其中一位嫁给绥德分区秘书处处长。^⑨实际上,米脂的妇女教育是如此之好,(绝大多数受教育的女性都是来自富有家庭),以至于该地成为

^④ 《米脂县县级三三制调查资料》;《陕甘宁边区革命史》第 219 页,227 页。所引材料下文还接着说,这种现象在高干会议后克服了。

^⑤ 贾拓夫《关于边区土地政策问题的报告》。

^⑥ 米脂县选举委员会,《准备阶级工作报告》,1941年7月26日,载陕西省档案馆、陕西省社会科学院编《陕甘宁边区整风文献选编》北京:档案出版社,1988年第4卷第136页。

^⑦ 《中央局关于三三制的指示》,1942年1月30日。《陕甘宁边区抗日民主根据地》第2卷第67页。当然,这比经历过土地革命的地方要好。在经历过分地的地方,地主们对共产党有“相当深的仇恨”同注40。

^⑧ 王震、曹力如《米葭工作》。

^⑨ 《米脂县杨家沟调查》第25页,32页,刘景范“工作报告”。

红军干部选妻的重点。在解放军内部，米脂县被称为“丈人县”^⑩。

夹在中间的县区干部

当王震及其它分区和县的干部推行边区政策的时候 他们发现他们被夹在中间。例如,1941 年秋 王震代表当地商界呼吁边区政府放宽政策。他认为反高利贷条例毁灭了当地的信用市场 对黄河两岸贸易的官家垄断断绝了当地商人的生意。边区政府对这两方面都不作让步^⑪。另外与统一战线有关的一个例子发生在 1941 年秋。当时国民党任命了米脂县新县长,绥德分区党组织不允许这样做。米脂属驻在榆林的国民党将军邓宝珊的管辖范围。中国共产党看重邓与中国共产党的友好关系 赶走米脂县长则会给邓难堪。中国共产党还担心 事态的恶化会使国民党派更坏的将军来以代邓。中国共产党上级下达的指示是 共产党人牢牢掌握基层政权 架空县长。最后 善于利用敌人内部矛盾的边区领导人意识到,新县长属于 CC 系 在省城缺乏强硬的靠山,不可能从上级得到多大的帮助^⑫。

边区政府与地方干部冲突最大的地方是财税问题。1940 年 国民党中止对边区的财政津贴。这种津贴原先维持边区政府的开支。由于中国共产党的大批政治、军事和教育人员现在都必须依靠贫困的边区本身来谋生。它只好实行极为严酷的财政紧

^⑩ 1989年2月29日对米脂县志办公室主任的访问。

^⑪ 王震等人1940年10月19日的请示和林伯渠1940年11月18日回信。《陕甘宁边区政府文献选编》第3卷,第498—500页。

^⑫ 《曹力如同志函》,1941年8月31日林伯渠复函,1941年9月15日。《陕甘宁边区政府文献选编》第4卷,第169—171页。

缩，并采取非常的新措施来增加财政收入^⑬。一件最为麻烦的事情是要求农民用牲口从边区北部的盐场运盐到南部地区去。这些盐即用来供应该处的人民生活，也运到国民党地区赚取法币。在边区政府的高压下，盐产量从 1937 年到 1942 年提高了 10 倍^⑭。但运盐的工作大大加重了农民的负担。农民抱怨说，运盐征用的牲口影响了农业生产。农民在运输途中面临伤亡的危险，而且因为报酬太低得不偿失。王震等人要求上级多给农民一些报酬，但一再被驳回。更为头痛的是边区政府认为农民可以从运盐中赚钱，要地方干部鼓励农民自动参加，而不要强迫农民。一位县长说：你要求我们：“不得有强迫命令的行为。如采取人民自愿，即无一家人去驮。”^⑮

边区政府也没有耐心来踢这种政治皮球，批评地方干部在“反动分子”散布的谣言面前“犹豫不决”^⑯。在边区政府给王震的一封信中，由中共西北局书记高岗联署指出：“实际上只不过是个别分子不满，甚至有的是特务分子的谣言”。紧接着边区政府用典型的斯大林式夸张言语宣称：“如果干部有信心，莫说二千驮，即使二万驮也可完成。”^⑰

显而易见，县和分区的干部不能被看成是反动分子或国民党特务所散布的谣言的俘虏，因而他们被迫满足中央的过多的

^⑬ 塞尔登 第 130—140 页，第 179—187 页，朗朗 第 168—204 页。房成祥和黄兆安 第 161—171 页。

^⑭ 斯朗 第 132—137 页。

^⑮ 《固临县呈文》，1942 年 8 月 14 日，《陕甘宁边区政府文献选编》第 4 卷 第 116—118 页；王震等人的信和边区政府 1941 年 6 月 22 日的回信，《陕甘宁边区政府文献选编》第 3 卷 第 321—322 页；王震等人 1942 年 7 月 5 日的信和林伯渠等人 1942 年 7 月 17 日的回信，《陕甘宁边区政府文献选编》第 4 卷 第 139—140 页。

^⑯ 《边区政府给固临的指示函》1941 年 8 月 20 日，《陕甘宁边区政府文献选编》第 4 卷 第 116—117 页。

^⑰ 林伯渠、高岗、高自立《边区政府绥德专署的复信》，1940 年 8 月 23 日，《陕甘宁边区政府文献选编》第 4 卷 第 139—140 页。

要求。这意味着他们给犹豫不决的地方干部下命令 由地方干部来强迫老百姓拿出他们宝贵的时间和牲口来运盐。虽然运盐工作无利可图，夹在中间的中层干部在运盐工作中两头受气的情形 在该时期的档案中随处可见。

高干会议和左倾决议

中央(边区)县和乡村干部之间的很多矛盾都在 1942 年秋解决了。当年 2 月 边区政府制定了一个新政策 规定那些不愿出勤运盐的人可以交付一定数额的现金，政府再用钱去雇人^④。这一办法消除了部分农民的不满。后来，从 1942 年 10 月到 1943 年 1 月 300 名县以上的干部集中到延安参加高干会议^⑤。党的所有主要领导人都到会讲话，标志着整风第一阶段的结束。这一整风运动是应毛泽东关于反对主观主义、宗派主义和教条主义的号召而开展的。县和分区的干部在这次会议领会了一些非常明确的精神 其中一条是高岗是边区政府中的拍板人物。毛泽东公开对高岗表示高度的赞赏^⑥。地方干部在会议上再次受到惩戒 说他们在运盐工作中 消极被动 是对高岗和西北局的消极抵制^⑦。但是 他们在开会回来时也带回另一种信息 边区政府要他们在税收和减租减息工作中开展对地主的斗争，采取

^④ 林伯渠等,1942 年 2 月 1 日,《陕甘宁边区政府文献选编》第 4 卷 第 145—154 页。

^⑤ 《陕甘宁边区革命史》第 243—244 页。

^⑥ 塞尔登,第 200—207 页。

^⑦ 《陕甘宁边区整风总结》,1943 年,《陕甘宁边区整风文献选编》第 7 卷 第 439 页。

更富于政治色彩的政策^②。这表明，边区进入又一个左倾阶段。这对米脂的传统精英阶层来说显然是一个坏消息。但对于中国共产党而言，这样的政策使得中央、县和乡村干部之间因为统一战线和超额任务等因素所造成的矛盾顷刻消解。

榨地主的油

在抗战的最初几年，中国共产党米脂当局的政策是政治上对地主进行笼络，在经济上榨他们的油。最明显的做法是在征取“救国公粮”的口号下对地主征重税。当时所遵循的原则是穷人出劳出力，富人出资出钱。

马维新家帐簿表明，1940年后税赋激增。在民国初比如在1916年税赋只是开支的1.6%在国民党统治时期比如1936年，税赋在总开支中的比重上升到5.2%而到中共统治时这种比重在1940年上升到48%、1941年上升到57%^③。战争后期的税还更多。对米脂地主的一份调查体现了这种趋势。他们所交的税在当年收入中比重1940年为16%，1941年47%，1942年为48%，1943年为79%。在11名接受调查的地主中其中4位在1943年所交的税超过了他们当年的总收入^④。从另一份关于一个村的调查，也可以看到累进税负担向地主倾斜。下列数字是1943年各阶级交的税在收入中的比重：贫农：0.3%；中农

^② 贾拓夫，1945年3月15日载《抗日战争时期陕甘宁边区整风财政经济史资料摘编》，第2卷第221页。

^③ 《米脂县杨家沟调查》第166页。

^④ 《米脂银城市地主材料》，1944年10月榆林地区档案6-1\X\10\60。《米脂县民丰区高庙山各阶层生活调查材料》，1944年10月30日榆林档案6-1\X\10\6。两位地主在1943年都支付起过其收入的税，其中一位在1941年后年年如此。

：26.4%；富农：42.2% 地主 222.3%^⑤。

很显然，地主被榨得很厉害。实际上他们的地租和其它收入统统拿出来缴税了，都还不够。为了补亏，他们只好卖地。所以在抗战时期，地主的田地慢慢地减少。我们看到的是费里德曼（Edward Friedman）、毕克侓（Paul G. Pickoicz）和塞尔登（Mark Selden 在《中国的乡村 社会主义的国家》（Chinese Village, Socialist State）一书中所说的那种“静悄悄的革命”，统一累进税使地主卖地，从而导致地权的平均化^⑥。当然，由于米脂的土地过分集中，真正的平均一时还实现不了。

抗战初期，中共对杨家沟的地主尽量采用体面的方式征税，党派受过良好教育的干部，通常是与马家有某种关系的干部去该村收税。其中包括马维新的女婿、分区秘书处处长安志文。这些税收人员与同情共产党人的马氏家族、小学教师马斯麒取得联系。马斯麒知道哪家有存粮，哪家会采取合作的态度。缴税的地主受表扬，表扬他们对抗日的贡献^⑦。

以减租政策为核心的下一轮对地主的榨取就要强硬得多，阶级斗争的色彩就要浓得多了。自抗日战争伊始，中国共产党就放弃了以前那种依靠暴力平分土地的做法，而采取了比较温和的减租减息。毛泽东在1940年12月的一次讲话中说明，农民交给地主的租要大约减少25%，而抗日地主的地权必须受到尊重，必须保证农民缴租^⑧。在已经实行了土地革命的地方，地权不再改变。因而地主无地可出租，这种政策也就成为无的放矢。

^⑤ 《米脂县民丰区高庙山各阶层生活调查材料》。

^⑥ 费里德曼（Edward Friedman）、毕克侓（Paul G. Pickoicz）和塞尔登（Mark Selden）：《中国的乡村 社会主义的国家》（Chinese Village, Socialist State），New Heaven: Yale University Press, 1991, PP. 84-86

^⑦ 米脂访问，1989年2月22日。

^⑧ 《陕甘宁边区革命史》第188-189页。

但是在米脂，只有很少几个村庄发生过分地，因此，减租是一件大事。

1937年—1940年何绍南任绥德分区专员的时候，他实际上有效地抵制了减租政策。甚至在何绍南被赶走之后，地方当局仍然袒护当地精英阶层，而没有强硬推行减租政策^④。到1941年底，地主们显然都没有按新的条例行事。通常的作法是，他们以换佃或收回自耕来威胁佃户，迫使佃户暗地里按原来的比率缴租^⑤。1942年初中共西北局下令彻底清查这一问题并由高岗亲自率领一个工作队进驻绥德^⑥。1942年10月也就是高干会议前夕，西北局颁布更为严厉的减租条例，将减租当作“所有工作的中心和重点”。以往在三三制原则下对地主所做的让步受到了批评，并要干部利用“国家的权力和民众坚定性”来摧毁地主的抵制^⑦。在高干会议上，这种信息被直接传达给县和分区干部，特别是由苏维埃时期就已担任主要领导的高岗、贺龙等人来传达。^⑧

米脂在11月开展了新的减租运动。起初的消息是开明地主主动减租。到12月又变了调子，《解放日报》开始报导对顽固地主的惩罚和农民们采取强硬措施的要求。新一轮的群众动员运

^④ 蔡思凡等《绥德米脂土地问题初步研究》第23—33页。贾拓夫，1945年3月15日载《抗日战争时期陕甘宁边区财政经济史料摘编》第2卷第221页。

^⑤ 王震等1941年12月12日，《陕甘宁边区政府文献选编》第4卷第21—23页。贾拓夫1945年3月15日载《抗日战争时期陕甘宁边区政府财政经济史料摘编》第2卷第220—221页。

^⑥ 《陕甘宁边区革命史》第233页。毛泽东在1941年5月发表的《改造我们的学习》一文中对这一时期农村调查有关键的作用。蔡思凡等人依据对绥德、米脂的调查写两卷本的报告。

^⑦ 《西北局关于减租的指示》，1942年10月10日，《陕甘宁边区政府组织史料摘编》第2卷第2634—270页。

^⑧ 《陕甘宁边区革命史》第197页；《陕甘宁边区整风总结》，《陕甘宁边区政府文献选编》第7卷第434页。

动显然在大行其道^④。

举一个很能说明问题的例子。这个例子表明米脂在处理地主与佃农关系中的过左行为已很普遍。一位名叫高兴周的地主向边区政府投诉说，他的佃户已经多年不缴租，使得他无法缴税。因此，他将田地收回自耕（条例上本来是完全允许这样做的）但是由于佃户一起来抗议，当地干部出面调解，结果将田地连同高家所种的庄稼一起，还给佃户耕种。然后，当地干部给这个地主定的盐捐特别高。该地主无奈，只好卖地。可当地干部又进行干预，不准他卖地，而且将他逮捕，抄家，搜去他家的谷子去抵税。当时边区政府的副主席是米脂著名的‘开明绅士’李鼎铭，但高兴周给边区政府的投诉信被转交给王震去处理。王震再将此信转交米脂当局。米脂当局在回复中根本不提当地干部阻止高兴周收回在土地自耕或卖地（这两者都是土地法载明的权利）的事，而是强调指出他私藏了足够缴税的谷子。而且还进一步指出，抄家过程中，并未如他所说，拿谷子以外的东西，因而，他犯有诬告罪。王震建议对这位地主从严处理，好让顽固地主引以为戒。^⑤很显然，上面的政策带有有利于佃户的阶级斗争色彩的时候，地方干部可以为所欲为。减租条例所载明的对地主的法律保护毫无用处。

^④ 《解放日报》，1942年11月9日，11月4日，11月25日，12月3日，12月3日，12月18日，12月27日。

^⑤ 林伯渠、李鼎铭给王震、曹力如的命令，1942年8月7日及1942年9月19日的复信，《陕甘宁边区政府文献选编》第6卷第290—291页。此事发生的时间表明，王震在高干会议之前就已预计到政策的转向，很可能是在高岗到绥德、米脂调查土地问题的时候。

基层的整风

累进税政策和带有阶级斗争色彩的减租措施，显然加重了米脂地主的负担。但是可能给人印象更深的是基层的整风。我们以往对整风运动的研究，将重点放在对延安知识分子的整肃。陈永发最近提醒我们注意整风运动的余震，特别是康生等人在1943年7月所发起的反奸细运动^⑥。毫无疑问，如果我们考察延安之外的整风，反奸细运动会特别引人注目。

1943年夏天，对整个陕甘宁边区来说都是非常严酷的日子。国共两党的关系在继续恶化，国民党的右翼越来越频繁地发表文章要求取消陕甘宁边区^⑦。国民党在边区南面集结了更多的军队。毛泽东与中国共产党其它领导人的内部通讯中可以看到，他们当真认为国民党可能采取军事行动。边区召开了一系列的群众大会来声讨国民党的成胁，《解放日报》社论严词谴责蒋介石国民党破坏抗日统一战线^⑧。正是在这种背景下，康生和高岗等人发起反奸细运动来“抢救失足青年”^⑨。

在绥德分区，这一运动先从绥德师范4个月的紧张学习开始。在1943年夏将重点放在揭露暗藏的国民党特务。现在回过头来看当时在报纸上披露的那些指控，委实荒谬得很。在最初9天的群众斗争大会上，学生们搬了很多袋石头到台上，供认参加

⑥ 陈永发《延安的阴影》，第59—94页。

⑦ 谢伟思（John S. Service, "Kuomintang - Communist Situation", 23/01/1943, 载周锡瑞编《在中国失去的机会：谢伟思二战时期的电稿》(Lost Chance in China; The World War II Despatches of John S. Service), New York: Random House, 1974, pp. 170—178.

⑧ 毛泽东致董必武电，1943年7月4日，《陕甘宁边区抗日民主根据地》第1卷，第337页；《陕甘宁边区革命史》第319—328页。

⑨ 《延安的阴影》第80—94页。